

# 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劃： 鑲嵌命題的爭議及其反省(上)<sup>1</sup>

吳鴻昌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試圖反省作為新經濟社會學主導性概念的鑲嵌命題。首先，我透過三個弔詭問題的提問，具體化鑲嵌命題在概念化經濟行動、經濟體系、經濟學對經濟實在的“干預”所遇到的理論困境。其次，為了解開此一理論困境，我進一步重置了鑲嵌命題所立基的兩條知識軸綫：一是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學科知識脈絡的轉折；二是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一方面，透過學科知識脈絡的重置，我指出了上述的理論困境乃根源于新經濟社會學的自我學科定位中。另一方面，透過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我考察相關理論的進展與困境，尋求上述困境可能的出路。最後，為了完備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計劃，本文結合上面兩方面的考察，以定位出可能的重建方向。

## 第一部分 導言

### 一 從學科發展的新舊之爭說起

2002年，Pierre Bourdieu生前的最後一年，在他法蘭西學院的講座中，針對“新科學社會學”的興起，Bourdieu提醒著我們，必須反思這種在科學中新舊對立概念的氾濫，這種對立妨礙了科學的進步，使人們不惜一切代價去進行區隔、強化差異，阻止或



延緩知識的有效積累與研究模式的穩定深化。他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對立，危害社會科學甚深<sup>2</sup>。

平行於新科學社會學的興起，在近30年社會科學的知識場景中，北美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也是一個令人無法忽視的現象。作為新經濟社會學推手，亦是經濟社會學史家的Richard Swedberg，甚至以社會運動來稱呼這樣的現象。Swedberg更進一步指出，從事後的回顧角度來看，1985年可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誕生之時，該年度，由於Mark Granovetter的鑲嵌 (embeddedness) 命題的提出，“新經濟社會學”此一稱號不但有了出生證明，更有了一份研究綱領<sup>3</sup>。

事實上，Swedberg這樣的說法，固然是當前新經濟社會學的通說與共識，然而，這是基於一種事後的回顧觀點，難免帶有事後合理化的色彩。但是，無可否認的，從某一時間起，經過相關的知識脈絡的轉折，以及相關學術建制與論述實作的確立（如課程、博士論文、期刊文章、論文集、讀本、研究手冊、教科書、相關教職等等），鑲嵌命題的確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有賴於此一主導性的概念的出現，並且，透過對此一主導概念的鋪陳（無論是透過經驗研究的細緻化、概念的修補，乃至於歷史系譜的構作，相似取徑的區隔），使學科的研究領域得以穩定與茁壯<sup>4</sup>。

然而，承繼上述 Bourdieu 對於知識發展新舊對立的反省，倘若以知識社會學の後設視角，審視新經濟社會學與鑲嵌命題的知識構作與學科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新經濟社會學所宣稱的“新穎之處”，以及相伴隨而生的主導性的概念與研究，不必然相應於某些新現象的發現，也不必然具有能取代舊典範的理論體系。相反的，由於社會科學概念的組成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載<sup>5</sup>，因而，所謂“新取徑”的出現往往不自覺地受到了舊理論所座落的“論述空間”的影響。相關的論述構作策略，也往往對於自身所興起



的學院內外的歷史社會條件與知識條件過於理所當然<sup>6</sup>。因此，新經濟社會學對於自身“新取徑”的宣示，與其說取代了舊理論的不足，不如說反映出其知識構作歷程中特有的知識論文化(epistemic culture)<sup>7</sup>。這種知識論文化，表現在相關論述構作對於舊理論輕率地揚棄與缺乏對於自身反身性的反省<sup>8</sup>，也表現在對於特定知識競爭對手的過度重視（如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sup>9</sup>，以及對於其他可能的經濟社會學取徑的忽視<sup>10</sup>。

簡言之，透過鑲嵌命題而崛起的新經濟社會學，固然有其理論上的貢獻與突破，但是，面對舊理論所關切的問題，以及社會學與經濟學的關係，乃至於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其所“宣稱的”與實際的進展總存在某些落差與不足。所謂“新取徑”的自我定位方式，也往往伴隨著偏見、忽視與侷限，以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的態度，阻礙著反省的可能與知識的進展。

## 二 立場的澄清與方法論上的提醒

基於上述的立場，本文在後續的討論中將試圖回答，發軔於1980年代，經歷了1990年代穩定發展，並企圖在21世紀達成完備的新經濟社會學<sup>11</sup>，何以在反駁經濟學的同時，卻陷入與經濟學可能共享相同意識型態的爭議（效率迷思），產生若干知識發展上的曖昧狀態？在分析經濟與社會的關係時，又如何會產生了理論化不足與概念化失當的困境？在面對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去管制、市場化等社會工程，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後果時，又為何會產生知識上的空白或難以著力<sup>12</sup>？

然而，在進行實際的分析之前，本文必須指出，上述的相關問題的由來，並非僅僅只是因為新經濟社會學仍處於發展迸生的狀態，因而對於相關理論取徑缺乏整合，對於相關理論命題缺少更細緻的修補<sup>13</sup>。相反的，本文認為，這些困境乃是“鑲



嵌”在新經濟社會學的自我學科定位與知識發展歷程中，更具體反映在作為主導性概念的鑲嵌命題的知識構作策略中。因此，有別多數回顧與評論文章對於新經濟社會學“新舊對立”的“肯認 (recognized) 與誤認 (misrecognized)”，以及對於鑲嵌命題知識構作策略的理所當然，本文試圖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構作過程，並對作為此一次學科主導性概念的鑲嵌命題，進行概念的後設反省，以理解上述問題的由來，並探詢相關可能的出路。

準此，本文必須提出三點理論與方法論立場上的澄清。首先，參照於諸多經濟社會學回顧性與評論文章，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只是描述新經濟社會學崛起的歷史，亦不僅僅只是對於既有的研究取徑予以分類或比較，也不企圖對鑲嵌命題進行更細緻的修補。相反的，本文試圖從知識社會學的後設視角，由鑲嵌命題所立基的兩條知識軸線（意即從舊經濟社會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轉折與源自於 Karl Polanyi 的鑲嵌概念）著眼，刻畫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脈絡與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並試圖透過這樣的重置，理解上述相關問題由何而來，又該往何去。

其次，關於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論問題。正如同 Bourdieu (1991) 所指出的，“知識的構作”一直有兩個面向：一個是知性的、一個是社會的。忽略知識構作這樣的雙重面向，將會導致傳統思想史內在理論與外在理論的爭鬥。內在理論採取的是絕對主義的實在論立場，強調的是學科知識的線性積累，因此，會對思想史採取理性重建的方式，以理解知識的進步。外在理論採取的一種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立場，強調的是社會原因對知識的影響，因此，會以一種歷史脈絡化的方式，研究知識的進程<sup>14</sup>。要避免這兩種非此即彼的理論困境，就必須注意學院作為“知識構作”場域所具有的特殊性，並從“社會學的社會學” (sociology of sociology) 出發，對於“知識構作”進行反身性地“知識構作”的



分析<sup>15</sup>。換言之，我們必須考察新舊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轉折所涉及的學院內外部的歷史與社會條件，正視相關的知識承載者所面對的論述空間與所發展的論述策略，質疑所謂新舊對立中所具有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並從鑲嵌概念的知識系譜著眼，考察相關理論發展所具有的“承繼與位移”<sup>16</sup>。

最後，本文的定位，並不單純只是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個案研究，亦不意味著將徹底地否定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無論是借古諷今，或是將其予以相對化、醜化甚至陰謀化）。相反的，新經濟社會學所追求的，對於經濟學與社會學關係的重新定位，對於經濟行動與社會關係的重新估量，此一知識計劃乃是一個嚴肅的課題。本文試圖從學科內外的發展與相關理論的知識系譜出發，後設反省新經濟社會學與鑲嵌命題，正是為了正視此一課題及其困境，並試圖釐清可能的重建方向。

基於上述，底下的討論，我們將會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我們將回顧與整理相關的評論，藉由三個弔詭問題的追問，具體化鑲嵌命題的理論困境，並進一步指出後設反省的必要性。其次，為了解開鑲嵌命題的三個弔詭問題的由來，我們將由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歷程著眼，透過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轉折，考察新經濟社會學發軔時所座落的論述空間與相關知識構作策略。其中，經濟社會學的新舊對立所隱含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將會是我們分析中的重點。接著，為了解開鑲嵌命題的三個理論弔詭，我們將進一步考察鑲嵌概念在知識系譜的“承繼與位移”，探究相關理論的進展與缺失。其中，Karl Polanyi的理論關懷與困境、Granovetter從“鑲嵌命題”到“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的轉折、Harrison C. White的“市場從網絡中迸生”(markets from networks)的命題、Neil Fligstein的“市場的構造”(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命題，以及Michel Callon的“經濟鑲嵌在經濟論述中”的“表現性”(performativity)命題，將會是我



們考察的重點。最後，我們將總結上述的討論，提出進一步可能重建方向的建議。

## 第二部分 鑲嵌命題所引發的三個弔詭問題

如前所述，新經濟社會學試圖透過社會鑲嵌此一主導性的概念，重新定位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關係，並重新估量了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的關係，藉以確立了自身的學科定位與屬性。基本上，鑲嵌概念或鑲嵌性思考的理論意涵，乃是透過反駁所謂“自律市場”的“絕對化市場觀念”，進而提出“經濟鑲嵌在社會中”的理論觀點<sup>17</sup>。Granovetter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透過反駁新古典經濟學、舊經濟社會學、道德經濟學、實質學派的經濟人類學所共享以自律市場為前提的現代性社會分化的論點，提出了新經濟社會學宣言—鑲嵌命題，證成了社會學介入經濟議題的正當性<sup>18</sup>。然而，此一新經濟社會學主導性概念的鑲嵌命題，卻在後續的理論發展過程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同時，不少評論與回顧文章也都指出鑲嵌命題在概念化與理論化方面的缺失，並試圖尋求新的出路。只是，相關的評論與爭議，似乎都未能正視這些問題在概念構作與理論設定上的真正根源，以及所涉及的理論與方法論上的複雜性。因此，以下的討論，我們將進一步透過三個弔詭問題的提問，具體化鑲嵌命題所具有的理論困境，進而指出後設反省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 一 鑲嵌命題的三個理論弔詭

首先，如果一切的經濟行動都鑲嵌在社會網絡裡，那麼自利的經濟行動如何可能？這樣的自利經濟行動又如何鑲嵌在社會網絡裡？



1985年，Granovetter 透過“低度與過度社會化個人”的想法<sup>19</sup>，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低度社會化個人的預設）與 Talcott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論（過度社會化個人的預設），都共享了原子化個人的不當預設，進而提出“經濟行動鑲嵌在社會網絡”的命題，並透過對話 Oliver E.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經濟學（因其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為新經濟社會學重拾經濟議題奠定了理論的“利基” (niche)。然而，參照於後續的研究與評論，我們卻發現鑲嵌命題對於自利個人的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假設具有高度的曖昧性。身為 Granovetter 學生的 Brian Uzzi 就曾指出<sup>20</sup>，鑲嵌命題有過於空泛的嫌疑，倘若要在實際研究中，精確化社會網絡的條件與效果，典型的市場行爲（Uzzi 稱之為 arm's length ties）必須被鑲嵌命題保留。此外，由於鑲嵌命題對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的曖昧性，以及對於交易成本經濟學作為理論對手的設定，鑲嵌命題亦產生了是否與新古典經濟學共享相同的意識型態—效率迷思的爭議<sup>21</sup>。同時，由於鑲嵌命題對於經濟人假設的默認，導致鑲嵌命題無法正視權力關係如何影響行動者的目標設定與利益，缺乏對經濟現象中權力關係的認識<sup>22</sup>。

換言之，鑲嵌命題雖從社會網絡出發，試圖提供另一套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與舊經濟社會學的替代理論，但是，由於鑲嵌命題缺乏對於社會化理論的重新反省，導致鑲嵌命題並沒有對於利益概念予以重新概念化<sup>23</sup>，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在行動理論與施爲 (agency) 概念上產生理論化不足的現象<sup>24</sup>。因此，要達成上述的理論企圖，新經濟社會學似乎不能僅僅滿足於指出社會結構對理性選擇的限制或補充，也不能只是批判經濟學理性自利個人預設的不足，而是必須重新概念化行動、利益、甚至行動者等概念<sup>25</sup>。

從上述的相關評論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鑲嵌命題看似為新經濟社會學在分析經濟現象與回應經濟學理論，找到了有力



的“利基”。然而，這卻弔詭地導致當新經濟社會學主張經濟行動鑲嵌在社會網絡時，卻無法或沒有意識到“該如何有別於經濟人假設，重新概念化經濟行動”的問題<sup>26</sup>。事實上，如果要首尾一貫地堅守鑲嵌命題，從網絡分析的關係論立場出發，那麼經濟行動是如何可能的，將會是鑲嵌命題的一大難題<sup>27</sup>。

其次，如果經濟鑲嵌在社會裡，那麼市場經濟如何可能？這樣市場經濟又如何鑲嵌於社會之中？

承上所述，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利基”，乃是建立在透過對話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理論與“市場與階序”(Markets and Hierarchies) 命題<sup>28</sup>，發展“既非市場、亦非階序”的社會網絡的替代理論<sup>29</sup>，並在後續的相關研究裡，發展出三種不同的經濟生活的協作模式：以社會網絡而建構的經濟團體（如商業團體、社群、各種人群組織）、市場與科層組織<sup>30</sup>。然而，這三種區分不但有實體化 (reification) 的危險，而且，似乎違背了“經濟鑲嵌在社會之中”的命題。因此，不少研究者都試圖發展“市場性”(marketness) 的概念，強調這三種模型不過是市場性（或說鑲嵌程度）高低程度的問題，並且試圖引入相關的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條件，來解釋這些高低程度的變異<sup>31</sup>。

上述這些理論上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爲了捕捉所謂後工業、彈性生產、網絡型組織等新經濟體系的轉型。相關的研究，也都企圖在分析層次上與因果解釋上尋求更特定而清楚的理論架構。然而，無論是三種模式的區分，抑或者“市場性”這樣的說法，卻弔詭地產生了一種兩難：倘若社會生活存在著階序、網絡、市場等模式的區分，那麼被歸屬在網絡的鑲嵌命題，又怎麼能夠理論化市場模式？倘若市場模式是存在的，那麼又該如何堅守“經濟鑲嵌於社會”的理論立場呢？

事實上，如果要從鑲嵌命題出發，發展新經濟社會學自己的市場經濟模式，不少評論者都指出，Granovetter 的社會網絡鑲





嵌命題，對於社會體系的系統性運作的考量是不足的，對於總體經濟現象的討論亦是有所欠缺的<sup>32</sup>。但是，這樣的難題，並非僅僅只是透過提問“社會網絡又鑲嵌於什麼之上”的追問，經由“制度轉向”或引入更具結構性的概念，企圖連結微觀與鉅觀層次就可以解決的。正如 Greta R. Krippner 與 Anthony S. Alvarez 所指出的，鑲嵌命題對於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理解，往往採取外部性 (exterior) 的理解（市場經濟 vs. 網絡協作模式），而非內在地理解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從社會中產生出經濟行動與經濟體系），這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sup>33</sup>。

簡言之，倘若要堅守“經濟鑲嵌於社會”的理論命題，新經濟社會學似乎不能只是滿足市場、組織、網絡等三種模式的區分，這不但會有實體化的危險，而且往往導致新經濟社會學無法將“市場經濟”概念化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無法從全社會的角度，理解市場經濟作為社會體系的一部份，理解經濟系統與其他社會體系的關係。然而，如何概念化系統性運作的市場經濟的共生，同時避免實體化的危險，以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特定性及其後果，將會是鑲嵌命題的一大挑戰。

最後，如果經濟確實鑲嵌在社會裡，那麼經濟是否有去鑲嵌的可能？如果經濟不可能去鑲嵌，那麼新經濟社會學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去管制與自由化等社會工程？又該如何勾勒其所帶來的社會後果？

承上述，鑲嵌命題由於對空間與制度相關因素的缺乏整合，導致對於全球化現象難以著力，對於資本主義系統層次的考察亦有所不足<sup>34</sup>。此一缺失，一定程度上也為相關學者所注意到。在新經濟社會學鄰近的相關取徑中，資本主義多樣性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學派的學者，試圖結合政治經濟學、法國管制學派、Niklas Luhmann 的系統論與 Polanyi 的鑲嵌概念去修補這樣的缺失<sup>35</sup>。不滿於這些取徑的缺失<sup>36</sup>，新經濟社會學者，也試圖透過



結合相關的新制度經濟學與組織新制度論，重拾古典社會學對於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問題意識，修正上述的偏失<sup>37</sup>。然而，無論上述的理論是否真的能從社會鑲嵌命題的關係論立場出發，避免實體化的危險，處理了系統與制度共生的問題，一個極為關鍵性的現象，卻往往為相關學者所忽略——經濟論述對於社會實在的“干預”(intervention)所產生的論述與實在的“迴圈效應”(looping effect)<sup>38</sup>。

事實上，社會實在並非只是靜止那裡等著社會科學家予以分析，人們的社會實作，以及關於這些實作的語意學(semantics)往往有著連動的關係，這兩者同時都構成了社會科學所欲分析的社會實在。因此，在新自由主義與市場教條主義當道的全球化場景下，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經濟的社會實在，似乎也明顯受到經濟論述的“語意污染”，產生了“經濟學發明經濟”的現象<sup>39</sup>。

換言之，面對著強調“市場自我管制”與“經濟的去鑲嵌”的新自由主義與市場教條主義，鑲嵌命題陷入了一種兩難：一方面，如果鑲嵌命題否定了自律市場的可能，斥之為錯誤的意識型態，那麼鑲嵌命題該如何理解上述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勾勒新自由主義在非西方國家所帶來的社會災難呢？另一方面，如果新經濟社會學承認市場去鑲嵌的可能，那麼該如何堅守鑲嵌命題呢？

簡言之，鑲嵌命題固然提供了新經濟社會學有別於經濟學強調市場自我管制的理論立場，然而，面對市場教條主義的興起所帶來的相關制度與政策的改變，以及相關經濟範疇所受到的“污染”，新經濟社會學似乎不能僅僅滿足於利用社會學事實駁斥經濟學模型的謬誤，如何將“經濟論述對於實在的干預”理論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將會是鑲嵌命題的一大挑戰<sup>40</sup>。



## 二 小結：三個理論弔詭與後設反省的必要性

從上述三個理論上的弔詭來看，我們可以指出鑲嵌命題在理論建構上的三個缺失，這些缺失一定程度上也刻畫了新經濟社會學於1980年代以降的限制與困境：一、僅從外部地去處理社會網絡對於經濟行動所造成的限制或機會，導致鑲嵌命題只是經濟學理性選擇的社會學修正版本。二、無法內在地理解經濟只是社會體系的一環，並正視其現代性的意義，以及所帶來的社會後果。三、無法同時將經濟學作為對話對象與研究對象，考察經濟論述的“干預”及其後果。

這些問題，雖或多或少為新經濟社會學內部與外部的評論所注意<sup>41</sup>，但是，這些評論往往卻未能正視這樣的困境在理論上與方法論上的弔詭性，因而也未能妥善地加以解決。相關評論與研究，無論是企圖引入更多傳統的社會學議題（如文化、性別、階層、法律、政治）來避免這樣的困境，又或者試圖為新經濟社會學納入更多的理論取徑（如階層研究、文化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來尋找出路，這些努力，不但無力於解決上述的困境，終究只是導致新經濟社會學缺乏更有力而清晰的整合性理論架構<sup>42</sup>，反而顯示出新經濟社會學內在的學科認同危機<sup>43</sup>。同時，新經濟社會學對於新古典個體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過度重視，卻又過於輕視其干預效果，這導致鑲嵌命題的相關研究，往往成為“商業社會學” (sociology of business) 的討論<sup>44</sup>。即便相關學者正視了此一問題，企圖重拾對於資本主義的討論，但是，往往無法提出分析鉅觀經濟現象與後果的理論架構，也無法提出資本主義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理論說明，更忽視了經濟論述的干預現象。

事實上，上述的理論困境，早在鑲嵌命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理論宣言時，就已經種下。Granovetter的鑲嵌命題雖有力地駁



斥了市場乃是自我管制，以及現代社會中經濟與社會乃是分化等論點，但是，此一命題的相關理論設定，卻未能正視與回應此一反駁所涉及的理論與方法論的難題（特別是在研究對象的建構上、方法論的警覺上與意識型態的反省上）。因此，雖然相關的評論與回顧一再地指出，鑲嵌命題是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宣言與研究綱領。但是，對於此一主導性概念的修補與精緻化，往往忽視鑲嵌命題所座落的論述空間的形構，以及相應的學科內外部的變化與知識構作策略，如何形塑了概念的理論意義與限制，亦忽略了概念的知識系譜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的承載。於是，上述的弔詭與困境，常常遭到忽視，使得相關的反省與討論，往往立基不當的理論起點，無法獲取真正的理論突破與知識進展。或者，這些難題雖受到正視，但往往可能只是理論上的宣示或只能另起爐灶，無助於理論整合與知識積累，更無力將相關知識的進展關連到經濟社會學百年來的發展，更遑論刻畫經濟現代性的發展與轉折。

由上述的討論來看，鑲嵌命題所引發的理論上的弔詭，並不能僅藉由批判某一學者、某一理論或某一學派而獲致解決<sup>45</sup>。相反的，上述的困境實際上涉及了學科的發展軌跡所特有的知識論文化，以及鑲嵌命題在概念系譜上的“承繼與位移”。因此，為探究鑲嵌命題的相關理論困境的由來與出路，本文將試圖由知識社會學的后設角度，重置鑲嵌命題所立基的兩條知識軸線（意即從舊經濟社會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轉折與源自於Karl Polanyi的鑲嵌概念）。一方面由學科內部與外部著眼，考察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轉折，深究其中所具有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探尋上述的理論弔詭的根源。另一方面，由鑲嵌命題的知識系譜著眼，深究此一系譜上理論建構的演變，以及由此導致的困境與出路。透過學科知識脈絡與概念知識系譜的考察，我們希望可以梳理相關爭議的由來與出路，避免浮濫的新舊的對立，進而得出學科反省與概念重置的可能。



### 第三部分 新經濟社會學知識發展歷程中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

如上述所指出的，鑲嵌命題所引發的弔詭，乃是深度地“鑲嵌”在新經濟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歷程中。因此，要理解鑲嵌命題的三個弔詭的由來，我們就必須回到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歷程，考察相關的論述空間的轉變與論述構作的策略，如何塑造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論文化，也設定鑲嵌命題的理論意義與侷限。其中，特別是新經濟社會學如何自我區隔於“舊經濟社會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將會是我們分析的重點。準此，底下的討論，我們將透過論述空間的轉型、學院建制化與論述構作策略，由學科外部與內部的角度，來理解新經濟社會學是如何從崛起到穩定，其中又涉及怎樣的知識構作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又如何引發上述鑲嵌命題的理論弔詭。

#### 一 學科外部歷史背景的簡介

1980年代，當新經濟社會學在北美崛起之時，大致上有三個重要的經濟現象觸發了相關議題的討論，因而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識的效果<sup>46</sup>。首先，美國資本主義的轉型，已非古典理論所能解釋，這導致了新議題與新理論的發展契機。新經濟社會學所崛起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在20世紀事實上經歷了一連串的轉型。於二次大戰前，科學管理的興盛、大型公司的出現與相關的公司購併運動，使得公司法人成為資本主義的統治者，引發了關於“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與“管理革命”等相關爭議<sup>47</sup>，這使得傳統對於資本家、統治菁英與資本主義的討論（特別新馬克思主義），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sup>48</sup>。並且，隨著1970年代，石油危機與停滯性膨脹的出現、福利國家的瓦解、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與福特化到後福特化生產模式的轉折<sup>49</sup>，



新的經濟問題也不斷地出現，無論在就業模式、產業結構、公司型態也有了各式各樣的發展。這些新興的趨勢與議題似乎逸出了既有經濟學與社會學理論的預測與解釋範圍。因此，美國經濟體系的轉型，似乎宣告了相關理論有改弦易轍的必要<sup>50</sup>。

其次，二次大戰後歐洲經濟的復甦，以及1970年代以降，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使得相關的發展理論（無論是現代化理論或依賴理論）受到了嚴重的考驗。諸多資本主義模式的平行發展，似乎挑戰了傳統經濟學與社會學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聚合 (convergence) 趨勢預測<sup>51</sup>。其中，特別是日本的崛起，其特殊的產業經連 (keiretsu) 生產模式，不但標示著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方式，而且，其優秀的競爭力幾乎擊垮了美國傳統的汽車與電子等產業，日方的資金更於1980年代大舉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收購美國公司，引發美國新一波公司型態的轉型。這些趨勢似乎顯示傳統相關社會科學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無論是歐陸中心或美國中心）經濟發展模本，似乎有商榷與修正的必要<sup>52</sup>。

最後，在上述的美國與全球的經濟轉型過程中，1980年代之後，相關學者似乎也意識到無論在先進已開發國家，還是在低度開發國家，內部都充滿著旺盛的“非正式經濟”。先前未曾為相關理論所考慮的行動者（如販夫走卒、失業工人、家庭主婦等）與人群團體（如族群、社群、幫派、移民團體、商業團體等），其對經濟生產的助益、對企業家精神養成的重要性與對正式經濟體系的貢獻，往往為傳統理論所忽視<sup>53</sup>。

簡言之，上述三個經濟型態的變化，無論是美國公司資本主義的變化、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發展與社會連帶對經濟發展的助益等，這些新變化“似乎”提供了新經濟社會學在發軔初期，經驗現象上的重要著力點。但是，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上述所謂新現象的出現時間與議題形成的時間，往往存在著不小的落差，而且，所謂新興現象在歷史根源與理論建構的複雜性，亦往往為



人們所低估<sup>54</sup>。但是，不可否認的，相關議題的確進入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之中，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得以自我區隔於所謂的舊典範。

## 二 學科內部的變革：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

上述的經濟轉變的歷史背景，固然有助於新經濟社會學的出現。然而，相關論述的形成，仍有待相關學院內的知識構作。正如 Krippner (2001) 所指出的，以鑲嵌命題為宣言的新經濟社會學，事實上仍受限於以 Talcott Parsons 為主的舊經濟社會學論述空間的影響<sup>55</sup>。雖然新經濟社會學在相關知識工具、學術社群、研究議題、理論取徑、學科間分工定位等方面，都有別於舊經濟社會學，然而，這兩者卻在如何透過參照經濟學以發展社會學的相關理論上，有著高度相似的論述構作策略，因而，也共享相同的理論困境。因此，如果要理解上述鑲嵌命題理論困境的由來，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接受新經濟社會學對於新舊對立的宣稱。相反的，我們必須重置從舊經濟社會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論述空間的轉型，並深究相關的學科建制過程與論述構作策略所具有的“誤認”與“誤判”。

### 舊經濟社會學：Parsons 的“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理論

雖說在古典社會學時期，經濟社會學已為歐陸相關學者所提倡，但是，由於二戰後的社會學學術重心由歐陸到北美的移轉，古典經濟社會學相關議題似乎為多數美國學者所忽視<sup>56</sup>。二戰後，整個社會學的重心，主要是由 Parsons 與相關學者（主要是哈佛社會關係學系的學者與 Parsons 的學生們）佔據了主導性的地位。因此，要理解舊經濟社會學所形構的論述空間（特別是



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就必須從 Parsons 對於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定位來談起。

事實上，從 Parsons 的知識發展軌跡來看，他對於經濟學的態度具有若干曖昧性。在 1937 年出版《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一書之前，Parsons 發表過關於德國學界的資本主義論戰與經濟學中的社會學元素等具有經濟社會學色彩的相關文章<sup>57</sup>。然而，由於 1931 年 Parsons 由哈佛經濟系轉任到剛剛創設的社會系，這場專業化歷程的轉折，使得他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裡，以分析實在論立場，一方面批判功利主義無力解決社會秩序的起源問題，另一方面，卻強調社會學與經濟學乃是從不同的角度對於行動體系的討論<sup>58</sup>。這也使得 1937 年之後，伴隨著 Parsons 個人生命的危機（家人去世與中年危機）與他對於社會學的定位（社會學主要討論社會行動的規範面），相關的資本主義與經濟社會學議題，消失於 Parsons 的理論視野之中，經濟學亦不包含在他所創設的社會關係學系中<sup>59</sup>。

換言之，雖然 Parsons 批判了功利主義的經濟理性不能作為社會科學的心理公設<sup>60</sup>，但是，Parsons 的論述構作的策略，卻不是徹底地重建相關的理論，反而是透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學術分工，一方面揚棄了他所熟知的具有經濟社會學色彩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sup>61</sup>，另一方面基於他對於社會學主要是討論規範與文化的定位，進一步在 1940 年到 1951 年，發展他從文化、人格、社會等三方面，對於制度化與社會化的討論<sup>62</sup>。

在經歷過 1940 年代零星幾篇跟經濟社會學有關的文章後<sup>63</sup>，於 1953 年，Parsons 試圖重拾經濟議題，以發展更具普遍性的行動體系理論。他首先提出著名的 AGIL 四種功能需求的架構<sup>64</sup>，企圖以此架構整合經濟學與社會學<sup>65</sup>。接著，在 1956 年，Parsons 更進一步在與 Neil J. Smelser 的合作中，完成了“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架構<sup>66</sup>。在此理論架構下，Parsons 將過去對於經濟與非經濟因





素的討論，轉化為在系統層次上，經濟此一次系統與其他社會次系統之間的雙元交換關係，並以貨幣媒介為模本，發展出一般媒介理論，來處理不同次系統的交換關係<sup>67</sup>。然而，在這個所謂“舊經濟社會學”的“經濟與社會”理論架構下，Parsons 依然沒有改變既有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工，他也不企圖取代經濟學的理论，反而是透過 AGIL 的架構轉譯相關的經濟學理論，將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社會系統的適應力提升問題，社會學則是研究社會系統的整合問題。

上述 Parsons 的“經濟與社會”理論架構與學科定位，雖企圖為社會學重新帶回經濟議題的討論，也試圖擴大經濟學對於經濟相關的社會議題的重視，但是，這樣的理論在經濟學與社會學內部並沒有獲得太大的回應<sup>68</sup>。並且，隨著1960年代學院內部與外部的騷動，Parsons 的功能論遭受到多方面的攻擊，其“經濟與社會”的理論取徑，也遭到了忽視或揚棄<sup>69</sup>。這樣的學科內部的擾動，也為新經濟社會學的出現，開創了學院內部的論述空間，當然，也埋下了上述鑲嵌命題所引發的理論弔詭的伏筆。

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Parsons 的“經濟與社會”理論，固然從系統層次、象徵媒介、功能分化等角度，處理了經濟系統與社會其他次系統的關係，這是舊經濟社會學的優點與貢獻<sup>70</sup>。然而，Parsons 的“經濟與社會”理論，乃至於他的一般理論，卻有著以下三種缺失：

1. 形式分析與實質命題的混淆。Parsons 向來所堅守的分析實在論的立場，事實上，忽略了從觀察者角度（形式分析）與參與者角度（實質分析）所可能產生的落差。形式與實質的混淆，導致 Parsons 從對行動因素的整合與拆解轉向到系統層次的理論建構時，卻意外地使行動者消失在他的參照點中<sup>71</sup>。這不但導致他實體化了相關的分析範疇（如功能分化變成了社會實在的分化），遭來合理化現



狀的非議，也使得從志願主義 (voluntarism) 行動出發來建構理論的 Parsons，弔詭地招來了“過度社會化個人”的批判<sup>72</sup>。

2. 經濟理性與經濟學理性的等同。延續上述對於形式與實質的混淆，Parsons 在建構相關理論時，往往將經濟學對於經濟行動的討論，等同於經濟行動本身，將經濟學對於經濟體系的刻畫，等同於經濟體系的運作本身，並從分析實在論的觀點，定位出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學術分工，進而以社會學彌補經濟學對於行動體系刻畫的不足（如用規範與文化因素，彌補經濟學只考量“目的與手段”的不足，用社會次系統之間的交換關係，彌補經濟學只討論經濟體系的不足）。因而，雖然 Parsons 意識到功利主義不足以生產妥善的“社會的理論”(the theory of society)，但是，他卻未能徹底地重建相關的理論，反而只是透過學院科系的分工與轉譯經濟學理論來達成行動理論的建構。
3. 意識型態立場的模糊。承上述，由於分析實在論對於形式與實質的混淆，以及將經濟理性與經濟學理性的等同，使得 Parsons 的理論，在形式分析上，不但有實體化的危險，也使得他對於系統間矛盾與不同價值的衝突，過於忽視。同時，在實質分析上，Parsons 也無法擺定他對於經濟學所立基的西方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等意識型態的立場<sup>73</sup>。這不但為他遭來了西方（美國）中心主義的批判，同時，也使得他忽視了社會科學的迴圈效應，低估了經濟學對於社會實在的干預現象。

簡言之，Parsons 的“經濟與社會”理論的根本問題，並不是新經濟社會學者所認為的，由於他過於強調規範與文化等因素，所導致“過度社會化個人”的缺陷，而是在於他無法從理論上與方法論上，後設反省“經濟／社會”與“經濟學／社會學”這兩



組關係的複雜性。因而，上述我們指出鑲嵌命題的三個弔詭，其實早在舊經濟社會學時期，就可以窺見端倪。然而，後Parsons時期美國社會學內部的擾動，並未使相關的問題獲得正視與解決。相反的，由於學術社群的更迭與論述空間的動盪，導致這些困境未被清楚地認識與反省，反而非預期地為新經濟社會學理所當然地承繼。

### 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

除了學院外部的歷史背景外，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主要是基於1960與1970年代美國社會學內部論述空間與學術場域的轉變。在此一期間，出現了大量從各個層面批判Parsons的論述，衝破了原來由結構功能論所支配的論述空間，使得新的理論取徑，得以有著力生根的可能。同時，1960年到1970早期，美國社會學相關的學術建制，如教員職缺、博士生人數、研究經費、美國社會學會的會員、新期刊的數目（特別是創辦於1974年的*Theory and Society*），都有顯著的成長，這也打破既有的學術再生產機制，提供了新理論的學院建制化的可能<sup>74</sup>。簡言之，正是在1960-70年代論述空間與學院建制雙重開放的前提下，1980到1990年代新經濟社會學得以生根著力。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新經濟社會學能在1980年代的崛起，除了上述的論述空間的轉型與相關學術建制的支持外，主要是受惠於1970年代兩個新理論取徑的發展：

一是圍繞著White所發展起來的社會網絡分析的“哈佛革命”<sup>75</sup>。White等人所發展的社會網絡分析的取徑，不但重新定義社會結構的觀念（由系統層次轉向了人際連帶），並且提供了描述此一結構的新技術工具。藉由社會網絡分析的取徑，相關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得以在有別“舊經濟社會學”的狀況下，重新介入經濟議題的分析，證成所謂“新取徑”的宣稱。而且，由



White 與其指導學生，所共同建立的知識社群，更是新經濟社會學知識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sup>76</sup>。

二是1970年代出現的一波關於組織現象的新理論浪潮。這些在1970年代已逐漸穩固的新組織社會學的取徑，一方面提供了新經濟社會學在發展初期的理論發展與學術社群的結盟對象，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得以取得學科發展的正當性，站穩學科發展的腳步；另一方面，新組織社會學的取徑，也將美國相關的新興經濟轉型的議題（特別是公司型態與產業結構），帶入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野中，使新經濟社會學得以在經驗現象上生根著力<sup>77</sup>。

簡言之，在論述空間與學科建制的雙重開放的前提下，透過新知識技術的發展、新知識社群的建立、新學術盟友的結合與新議題的引入，的確為1980年代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然而，除了上述的論述空間的轉型與相關學術的建制外，要理解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論文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一定程度是為了反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入侵<sup>78</sup>。1970年代，以 Gary S. Becker 為首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侵入傳統屬於社會學分析領域的犯罪、家庭等議題<sup>79</sup>。面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入侵與殖民，使得相關社會學者，試圖重拾經濟議題予以反擊。因此，社會學與經濟學的交鋒，亦定位出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樣貌。

### 新經濟社會學的論述策略：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交鋒

從論述策略的角度來看，新經濟社會學要重返社會學對經濟議題的研究，首先關鍵性的任務，乃是區隔出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差異，並藉此確立自身的理論原則與論述上的正當性（意即所謂的知識論文化）。其中，關於經濟學行為假設的缺失、對社會結構外生變數的忽視、理論模型的非現實性等等，正是社會學對於經濟學的質疑所在。因此，我們將透過上述三個層面來討論新經



濟社會學批判視野中的經濟學缺失，並藉以勾勒出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論文化。

首先，在行為假設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模型乃是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基於行動者效用函數的設定，透過原子化、自利、追求最大效益的理性行動者的假定，預測行動者可能會如何選擇，以及“應該”會如何選擇（尋求約束條件下能否達成均衡）。然而，對於新經濟社會學而言，這樣的看似原子化理性行動者的假定，不但犯了低度社會化個人的謬誤，在現實中更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將許多必須考量主觀的變數，如認知與評價過程，簡單地予以忽視。相較於此，新經濟社會學則是將行動者的理性視為一種變數，探討在怎樣的特定情境、脈絡與社會關係下，行動者的理性會受到約束或鼓勵<sup>80</sup>。

延續著上述對於行為假設的批判外，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學的批判，主要還有關於“內生變數與外生變數”的問題。當經濟學家在處理經濟議題，試圖在“約束條件”下尋求“均衡解”時，往往會將許多變數，視為是“外生變數”，透過“其他一切都不變的假設”(*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 予以忽略，以凸顯所欲關心的“內生變數”之間的關係。對於社會學而言，這種被視為固定不變的“外生變數”，往往乃是在社會實在上具有重要作用與意義的社會結構變數<sup>81</sup>。因此，對於經濟社會學而言，討論這些在經濟議題上被經濟學視為“外生變數”的社會結構，正是回應新古典經濟學的最佳切入點，社會學也能藉此將社會結構概念引入，建構起對經濟更具現實基礎的(*realistic*) 分析。

除了上述兩種對於經濟學的批判外，新經濟社會學家們也意識到，這兩個學科在理論建構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方法。新古典經濟學所採取的是“as if”的方法論工具主義的立場<sup>82</sup>，追求的是這種模型的預測能力，採取的是在約束條件與效用函數的設定下，所進行數學化公理推導的簡潔模型(*clean models*)。



社會學則追求的是對於社會行動的“客觀限制與主觀意義”的描述與解釋，採取的是用量化、質化與歷史比較等方法來建構理論 (dirty hands)<sup>83</sup>。換言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強項與弱項正是在同一處，經濟學的簡潔模型，雖然看似優雅明晰，但是所付出的代價乃是忽視了經驗世界的存在，導致其理論的非現實性。因此，新經濟社會學正可以站在這個基礎，透過大量對經濟現象的經驗研究來驗證與駁斥經濟學模型，並藉此發展自己的理論。

簡言之，從上述的討論當中，我們指出新經濟社會學正是透過對於新古典經濟學三個層面的批判上，建立自身對於經濟議題發言的正當性：一、參照於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社會學認為經濟理性乃是受到社會結構影響的，具有社會脈絡依賴的變異性。二、對於經濟學視為固定不變的外生變數，社會學則將之視為社會經濟生活中重要的社會結構變數。三、新經濟社會學可以透過經驗事實來檢驗經濟學的簡潔模型，進而建立自己的理論。

### 新經濟社會學的穩定化與其限制

從事後回顧的角度來看，正是透過上述的論述空間與學術場域的轉變、新的知識工具與知識社群的建立、以及相關論述策略的定位，1980年代，隨著鑲嵌命題此一主導性概念的出現與發展<sup>84</sup>，新經濟社會學在北美知識場景中崛起，並在1990年代，隨著相關的學術建制與知識構作的完備<sup>85</sup>，新經濟社會學邁向了穩定的知識再生產的機制<sup>86</sup>。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隨著新經濟社會學的學術再生產機制的完整，新經濟社會學亦出現一定程度的封閉性與排他性<sup>87</sup>。幾乎在新經濟社會學崛起到穩定的同一時期內，同樣在美國社會學內部，至少還有以 Etzioni 為首，重視規範與道德因素並具有跨學科特性的社會經濟學 (socio-economics)<sup>88</sup>，以及 Zelizer 與 Smith 所



強調的文化與認知的取徑<sup>89</sup>。這些相關取徑的發展，要不就是被排斥、忽視，要不就是雖被納入卻聊備一格<sup>90</sup>。事實上，這種對於經濟議題的道德因素與文化解釋的排斥傾向，以及拒斥跨學科的取徑，除了因為學術社群的建立歷程所產生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外，一定程度是由於新經濟社會學乃建立於後Parsons時期論述空間下，因而對於Parsons的反動，亦為新經濟社會學所承繼<sup>91</sup>。

只是，參照於上述我們對於Parsons舊經濟社會學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新經濟社會學雖透過鑲嵌命題，拒斥Parsons的分化理論與學科定位，試圖重拾經濟議題來反擊經濟學帝國主義。然而，新舊經濟社會學卻在理論建構上具有類似的缺陷與困境。首先，兩者都試圖從經濟學理性選擇的不足上，建構自己的理論，因而都只是在相關議題上凸顯了對經濟學而言的外生變數的重要性，導致對經濟的社會行動，缺乏更具理論與方法論的反省與重建，因此也缺少對於市場經濟體系更具社會學意義的理論建構。其次，這兩者同樣也缺乏方法論上的警覺，形式分析（觀察者角度）與實質分析（參與者角度）往往受到混淆，因而，相關的分析範疇往往有著實體化的危險。最後，兩者同樣缺乏對於自身與經濟論述的更具反身性的後設反省，因而缺乏對於經濟學作為現代性經濟議題的支配性論述，此一現象的關注，也忽視了經濟論述對於相關經濟議題的干預作用與語意污染，導致社會學在分析相關現象有沾染上經濟論述的意識型態之虞。

### 三 小結：新舊學科對立中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

在上述的討論裡，我們大致考察了學科內外部的變動，如何促成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學院外的新興議題，以及學院內部的“後Parsons時期”的論述空間與相關論述策略，的確也刻畫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特性。社會網絡分析與新組織社會學的結合，隨著相關的學術社群與學院建制的支持，新議題、新知識技



術的引入，以及新理論命題的發展，的確使得新經濟社會學得以在區隔於舊經濟社會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定位自己。然而，正如我們一再指出的，這種對於新舊對立的“肯認與誤認”，卻也導致了前述三個理論性的弔詭，早在鑲嵌命題成爲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時，就已經埋下。

上述新經濟社會學三個理論弔詭的由來，正是由於發軔於後Parsons時期的新經濟社會學，對於自身所興起的知識條件與論述策略，缺乏反身性的反省，忽視了既有的論述空間的限制，因而，對於舊經濟社會學的貢獻與侷限，往往存在著誤認與誤判。這導致新經濟社會學的相關論述，在利用社會網絡分析切入經濟議題時，理所當然地將社會結構的概念，由系統層次轉向人際連帶時，揚棄了對於總體貨幣經濟現象的關注。同時，更嚴重的是，新經濟社會學雖試圖打破舊經濟社會學所劃下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工，但是，相關學者卻未能正視“經濟／社會”與“經濟學／社會學”這兩組關係在概念上與語意上的混淆，以及此混淆所導致在研究對象的建構上、方法論的警覺上、意識型態的反省上等相關難題。因而，新經濟社會學雖試圖重新估量經濟與社會的關係、重新定位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卻意外地掉入了舊經濟社會學相似的理論困境。

簡言之，透過上述的知識社會學考察，我們指出了鑲嵌命題的三個理論弔詭，乃是根源於新經濟社會學自我學科定位中的“理所當然”與“似是而非”。這種對於新舊對立的“肯認”與“誤認”，正如Bourdieu所指出的，往往只會過於理所當然地強化差異與相互區隔，反而掩蓋了更根本問題的浮現<sup>92</sup>。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這些弔詭的問題，或多或少都爲一些學者所意識到，因此，在後半部分的討論，我們將進入鑲嵌命題概念構作的知識系譜，探究相關理論發展的貢獻與侷限，以定位出可能的重建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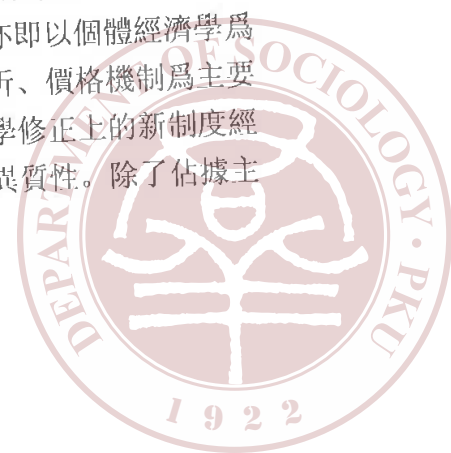
## 注釋

- 1 本文乃是源自於2002年台大社會所博士班“經濟社會學專題討論”課程的期末報告，感謝陳志柔、鄭陸霖、陳東升三位老師的指導。同時，也感謝台大社會所曾嫻芬老師所提供的意見與鼓勵，此外，也必須感謝指導教授葉啟政老師，多年在社會學理論方面的提攜與訓練。針對本文的寫作，特別感謝台大博士班學長林峰燦與學弟蔡博方，長期以來的討論所提供的洞見，以及在寫作修改上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台大社會所碩士班學生李佩璇與江浩在文字校正與書目整理上所提供的幫助。
- 2 Pierre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8.
- 3 Richard Swedberg,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at is Ahead?” *Acta Sociologica* 40 (1997), 161–182.
- 4 類似本文的研究，透過某一主導性的概念對於特定社會學次領域的回顧，請參考林峰燦，〈想像世俗化：世俗化命題之爭議及其反省(上)〉，《社會理論學報》第10卷第一期(2007)，113–198。
- 5 關於概念構成的歷史意義承載請參見Margaret R. Somers, “What’s Political or Cultural about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oncept Fo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13 (1995), 113–144。利用Somers的理論來反省新經濟社會學的討論，請參考Greta R. Krippner,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 (2001), 775–810。
- 6 北美新經濟社會學的出現，主要有社會學學科內部與學科外部兩種原因：在外部原因上，主要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轉型，以及在知識場景的論述空間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入侵，導致社會學家打破既有的學科藩籬，拾回對經濟議題的研究，作為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回應；在內部原因上，主要是既有的結構功能論（“經濟與社會”的典範）、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發生了典範危機，使得以社會網絡分析與組織新制度論為主的相關學者，得以從既有學科論述空間上的裂縫，找到社會學內部的著力點，使新經濟社會學得以創生。關於外部原因的簡述，請參考Fred L. Block,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George Ritzer, “The Permanently New Economy: The Case for Reviving Economic Sociology,” *Work and Occupation* 16 (1989): 243–73。至於學科內部的相關討論，可參考Arthur L. Stinchcombe,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Richard Swedberg, “The Critique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Perspective During the Paradigm Cris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9 (1986), 91–112;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35, 1, (1987), 1–215;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991), 251–276; Richard Swedberg, Ulf Himmelstrand, and Goran Brulin,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emises and Promises," *Theory and Society* 16 (1987), 169–213; Mark Granovetter,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in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89–112; Olav Velthui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rom Talcott Parsons to Mark Granovetter,"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8 (1999), 629–649。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考後面第三部分的討論。

- 7 Karin Knorr-Cetina, *Epistemic Cultures: 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除了以社會網絡分析為主的相關研究外，亦得利於組織新制度論的崛起（後面會詳述）。然而，Arthur L. Stinchcombe在 "On the Virtues of the Old Institu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1997), 1–18中就曾批判新制度論，過於忽視“組織舊制度論”的提問與貢獻，缺乏對於制度如何制度化、組織如何組織、制度又如何影響組織的組建與瓦解等問題的妥善分析。此外，Charles Perrow在 "Organisational Theorists in a Society of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 (1992), 371–80與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2000), 469–476中更嚴肅地指出，1970年代以降，受到“開放系統典範”影響下的新組織社會學（包括組織生態學、資源依賴理論、組織新制度論），對於“大型組織”對社會的統治（組織化社會的來臨）與組織社會學往商學院的遷移等現象，過於理所當然，缺乏反身性地反省組織社會學所座落的社會環境，忽視“組織化社會”與商學院的學科建制，對於組織理論相關概念範疇的影響，也因此，對於組織所帶來的社會後果與危害，亦缺乏關心。基本上，本文乃是在站在類似的立場，試圖對於新經濟社會學與鑲嵌概念，進行後設的考察。
- 9 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敵手，主要是新古典經濟學（亦即以個體經濟學為主，基於稀少性命題、效用最大化、均衡與邊際分析、價格機制為主要分析工具的經濟學論述），以及奠定在新古典經濟學修正上的新制度經濟學。然而，事實上，經濟學內部其實具有高度的異質性。除了佔據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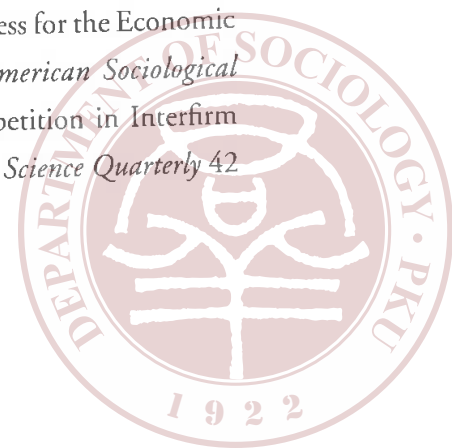


流位置的上述兩派外，至少還存在有演化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奧地利學派、新興凱因斯學派、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後凱因斯學派、舊制度經濟學、管制學派等等。這些學派的取徑與社會學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程度的親近性，但是卻往往為新經濟社會學所忽略，這導致新經濟社會學對於相關總體經濟現象（如經濟成長、景氣循環、失業、貨幣金融）的討論，幾乎付之闕如。

- 10 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回應，並不僅限於以網絡分析與組織社會學為主要取徑的新經濟社會學。僅以北美地區為例，幾乎在同一時間，至少，還存在以 Amitai Etzioni 為首的，對於經濟學採取道德批判且具有跨學科特性的社會經濟學 (socio-economics)，以及標榜文化與認知取徑的 Viviana A. Zelizer 與 Charles W. Smith 等人。雖然，在1990年代以後，新經濟社會學的相關讀本、手冊與回顧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這些取徑，但是，1980年代新經濟社會學剛發軔時，事實上是排斥所謂的道德、文化認知等解釋因素（斥之為過度社會化個人的謬誤或因果上的不明確）。1990年代之後對於這些取徑的重新納入，可以說只是具有展示性的意義，而非理論上的整合。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 Zelizer 對於自己與新經濟社會學尷尬與曖昧關係的說明，Viviana A. Zelizer, "Pasts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1056–1069。關於經濟社會學如何透過排斥舊理論，拒斥反學科與跨學科的取徑，進而確立自己學科正當性的考察，請參見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 的分析，以及後面第三部分的討論。
- 11 基本上，這是基於1985年鑲嵌命題的提出，以及1994年與2005年兩版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2005) 所做的定位。
- 12 關於這些問題更詳細的討論，請參閱第二部份關於鑲嵌命題的三個理論弔詭的討論。
- 13 上述這種對新經濟社會學的捍衛，以及企圖整合經濟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的嘗試，請參考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The Revival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2), 1–31。
- 14 Pierre Bourdieu,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 Forum* 6 (1991),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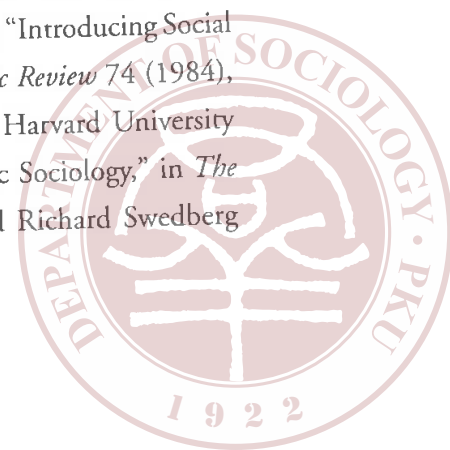
- 15 Pierre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 16 在新經濟社會學眾多回顧與評論文章中，大概只有 Greta R. Krippner,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 (2001), 775–810 與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 是採取知識社會學的取徑來考察新經濟社會學。Krippner 主要是借用 Somers 所謂概念具有歷史意義承載的想法，對於鑲嵌命題進行了概念構成的歷史社會學考察。Convert and Heilbron 則是批判以人際互動來考察知識構作的相關取徑，試圖從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出發，考察了新經濟社會學的學院建制化過程。然而，本文必須指出，Krippner 的概念構成歷史社會學，雖注意到論述空間與知識系譜的重要性，但是，卻無法交代清楚概念是如何歷史承載的，忽視了相關學科建制化歷程與知識構作中的“肯認與誤認”，因而，他雖對鑲嵌命題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但是卻無法指出可能的重建方向。此外，Convert and Heilbron 雖考察了新經濟社會學所立基的科學正當性與制度正當性，如何形構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知識特性與自我定位，但是他們對於論述空間的形構、論述構作的策略與概念在知識系譜上的承繼與位移等相關討論，卻有所不足。因此，一定程度上，本論文試圖整合這兩種互補的取徑與研究成果。
- 17 關於“鑲嵌概念”與“絕對化的市場觀念”的對比，更深入的討論，請參閱 Bernard Barber,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 Some Notes on 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Syst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217–234; "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and Beyond," *Social Research* 62 (1995), 387–413。
- 18 請參見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第四部分中關於 Granovetter 的討論。
- 19 Granovetter 這個想法主要是來自 Dennis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183–93 的啟發。
- 20 Brian Uzzi,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674–698;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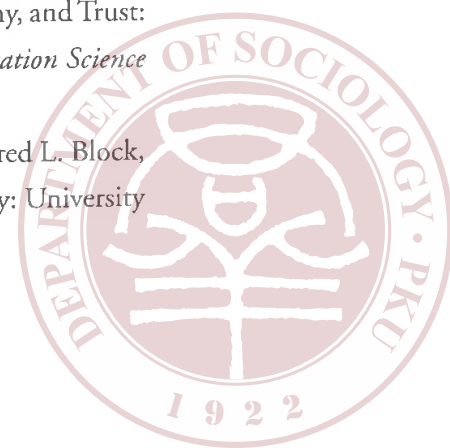
- (1997), 35–67;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999), 674–505; Brian Uzzi and Ryon Lancaster, “Embeddedness and Price Formation in the Corporate Law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004), 319–344.
- 21 Neil Fligstein,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Agreements, Disagre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Market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3), 61–78; Neil Fligstein, and. Luke Dauter,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105–128.
- 22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G. Roy, *Socializing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3 Richard Swedberg 就曾從 Weber 行動理論的角度指出，鑲嵌命題主要的問題在於沒有對行動理論予以重建，缺乏對於利益概念的理論化，導致鑲嵌流於空洞的理論宣示，因此，經濟社會學的任务必須發展社會學的利益概念，探討“社會鑲嵌”與“經濟社會行動”的關係來修正鑲嵌命題，請參考 Swedberg, Richard, *Max Weber and the Idea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Can There Be a Sociological Concept of Interest?” *Theory and Society* 34 (2005), 359–390.
- 24 Thomas D. Beamish,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993–1014 就曾指出經濟社會學對於施為概念有低度理論化的問題。此外，雖然我們這裡的討論，主要是針對以社會網絡分析為基礎的鑲嵌命題為主。但是，即便是以組織新制論為基礎的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同樣在相關的利益與施為等概念上，有理論化不足的現象。請參考 Paul DiMaggio, “Interest and Agent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ed. Lynne G. Zucker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1988), 3–22; Neil Fligstein, “Social Skill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 (1997), 397–405;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 (2001), 105–25.



- 25 Jens Beckert就曾指出，Granovetter的鑲嵌命題乃立基於一個不當的理論起點，導致新經濟社會學無力去回應經濟學。他認為經濟社會學的任務，並不是僅僅指出社會結構對理性選擇的限制（如Granovetter與Coleman的理論），也不能只是批判經濟學關於經濟人的預設，而是必須重建經濟行動理論。他進一步指出，此行動理論的重建根基，乃是放棄以目的手段為模本的相關行動概念，並透過批判性重新詮釋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始祖Frank Knight的風險／不確定的區分，以及Keynes基於不確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均衡的批判、乃至於當代經濟學內部的資訊經濟學 (Information economics) 革命。簡言之，Jens Beckert認為，要重建經濟行動的相關概念，必須正視在不確定與偶連性 (contingency) 的狀態下，所謂的理性行動者是不可能事先就形成明確的偏好排序，也不可能認知到能最大化效用的手段為何，這此一前提下，為了使行動得以可能，行動者只能基於實用主義式的意圖理性（行動者在事前沒有明確地對目標與手段的認識），援引相關的社會裝置 (social devices) 去化約複雜性（如習慣、制度、網絡、權力等）。關於上述論點進一步討論，請參閱Jens Beckert, "What is Sociological about Economic Sociology? Uncertainty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A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5 (1996), 803–840; "Agency, Entrepreneur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20 (1999), 777–799; *Beyond the Market: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trans. Barbara Harshav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mbeddedness: How Shall We Conceptualize Economic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 (2003), 769–787。至於，資訊經濟學對既有經濟學典範的革新，請參考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4)。
- 26 倘若鑲嵌命題無法正視此一問題，那麼鑲嵌命題將會非常相似於James S. Coleman版本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意即以經濟學理性選擇為模本，透過指出這種理論的不足，引入相關被經濟學視為外生變數的社會學結構參數來加以修正）。如此一來，社會網絡與經濟行動的結構與施為的問題，將會被轉譯成Coleman所主張微觀理性選擇與鉅觀社會結構的連結問題。換言之，這正是本文所謂鑲嵌命題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曖昧性所在。關於此點請參照James S. Coleman, "Introducing Social Structure into Economic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84–88;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166–182。
- 27 從社會網絡分析出發，對於此議題的理論性與一般性討論，請參考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ocial Networks Can Resolve Actor Paradoxes in Economics and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1 (1995), 58–74; *Identity and Control: How Social Formations Emer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Mustafa Emirbayer and Jeff Goodwin,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1994), 1411–1454; Mustafa Emirbayer and Ann Mische,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998), 962–1023。
- 28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77–107。
- 29 請參考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並進一步比較，William G. Ouchi, “Markets, Bureaucracies, and Cla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 (1980), 129–141。
- 30 關於這三種模式的相關文獻，請參考 Grahame Thompson, Jennifer Frances, Rosalind Levacic, and Jeremy C. Mitchell, eds.,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Life* (London: Sage, 1991); Grahame Thompson, *Between Hierarchies and Markets: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k Granovetter, “Business Groups,”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453–475; “Business Group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ition,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429–450; Paul S. Adler, “Market, Hierarchy, and Trust: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Organization Science* 12 (2001), 215–34。
- 31 關於利用市場性概念或鑲嵌程度高低的相關文獻，請參考 Fred L. Block,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John Li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1997), 341–60; Brian Uzzi,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674–698;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1997), 35–67;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999), 674–505; Brian Uzzi and Ryon Lancaster, "Embeddedness and Price Formation in the Corporate Law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004), 319–344.

- 32 關於此點，已為眾多文獻所指出，請參閱Geoffrey Ingham, "Review essay: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0 (1996), 549–566; "Some Recent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 (1996), 243–275; Neil Fligstein,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656–673;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Victor Nee and Paul Ingram,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ed.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19–45; Giovanni Arrighi, "Braude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Review* 24 (2001), 107–23; Roberto Rizz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c Sociology, Setting out from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2006), 31–48.
- 33 Greta R. Krippner and Anthony S. Alvarez,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219–240.
- 34 這一點最清楚地由兩位地理學家所指出，請參考Martin Hess, "Spatial Relationship?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mbeddednes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 (2004), 165–186; Jamie Peck, "Economic Sociologies in Space," *Economic Geography* 81 (2005), 129–175.
- 35 資本主義多樣性學派的取徑，往往是從國家治理與經濟管制的角度來研究相關經濟體的發展，其對於鑲嵌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基於Polanyi的





- 版本。相關文獻與理論發展，請參考 J. Rogers Hollingsworth,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Wolfgang Streeck, *Govern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Performance and Control of Economic Sect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Philip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Bob Jessop, "Regulationist and Autopoieticist Reflections on Polanyi's Account of Market Economies and the Market Society," *New Political Economy* 6 (1997), 213–32.;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overnance",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1) at: [http://www2.cddc.vt.edu/digitalfordism/fordism\\_materials/jessop2.htm](http://www2.cddc.vt.edu/digitalfordism/fordism_materials/jessop2.htm)。
- 36 基本上，針對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理論架構，新經濟社會學者通常都會認為該學派往往只是描述與比較個別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史，並非真正的研究資本主義與其特殊的動力（利潤動機），而且往往會有過於整體論的危險，流於對資本主義予以分類與命名，忽視了鑲嵌命題所欲追求的社會與經濟的動態關係。相關的評論，請參考 Richard Swedberg,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Agenda,"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0; Greta R. Krippner and Anthony S. Alvarez,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219–240。
- 37 例如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7);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uro F. Guillen, *Models of Management: Work,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Argentina, South Korea, and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On Capit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8 基本上，Ian Hacking 就是以科學實驗為參照的“干預”概念來超越科學哲學中建構論與實在論的爭議，並且進一步從此概念出發，指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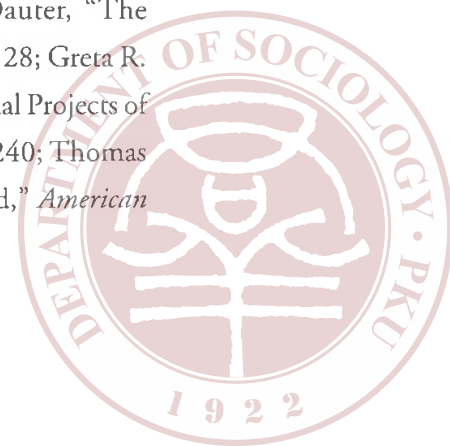
文社會科學之所以有別於自然科學，乃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論述與實在的關係，在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會產生“迴圈效應”。請參閱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9 關於“經濟學發明經濟”現象的相關研究，請參考第四部分關於“表現性命題”的討論，以及下列相關文獻 Timothy Mitchell, “Fixing the Economy,” *Cultural Studies* 12 (1998), 82–101; “The Work of Economics: How a Discipline Makes its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2005), 297–320; “The Properties of Markets,” 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4–275; Francesco Guala, “Building Economic Machines: The FCC Auction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2 (2001), 453–477; Johanna Bockman and Gil Eyal, “Eastern Europe as a Laboratory for Economic Knowledge: The Transnational Roots of Neoliber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2), 310–352; Daniel Breslau, “Economics Invents the Economy: Mathematics, Statistics, and Models in the Work of Irving Fisher and Wesley Mitchell,” *Theory and Society* 32 (2003), 379–411。
- 40 對於“經濟學發明經濟”的迴圈效應與相關語意污染，一個簡單理解是，經濟理念滲透進政策之中，影響了“經濟的社會實在”，例如 Peter A. Hall, ed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1993), 275–296; John L. Campbel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7 (1998), 377–409; Sarah L. Babb, *Managing Mexico: Mexican Economic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and Sarah Babb,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2002), 533–79; Mark Blyth,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等文獻所主張的。因此，新經濟社會學似乎只要轉向於所謂的“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就能解決此一問題，請參考 Richard Swedberg et al., “Economic Sociology as Public Sociology,” *Socio-Economic Review* 5 (2007), 319–367。然而，本文必須指出，經濟論述與經濟實在的關係，比上述的說法更複雜許多。特



別是相關的“經濟實在”的定義，往往受到相關經濟論述的影響，而且，這些由論述所定義的相關經濟範疇，亦往往為常民與學者所援引。此外，相關論述與知識技術，不僅可能影響經驗實在的定義，甚至從根本上構成 (constitute) 了相關的知識客體與知識主體。不少學者就從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 的觀點指出，廣義的經濟論述，如經濟計量技術、總體經濟計劃、財務工程、保險統計知識、會計知識與技術等等，不但構作了相關經濟實在（最為明顯的是當代衍生性金融商品與相關的財務操作），也使得相關經濟主體得以可能（如投資者、財務專家、管理顧問）。關於治理術的文獻，請參考 Colin Gordon,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52;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87–104; Mitchell Dean,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1999)。由治理術觀點出發對於經濟相關議題的研究與討論，請參考 Nikolas Rose, “Governing by Numbers: Figuring Out Democrac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6 (1991), 673–692; Nikolas Rose and Peter Miller,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6 (1990), 1–31; Peter Miller, “Governing by Numbers: Why Calculative Practices Matter,” *Social Research* 68 (2001), 379–396; Peter Miller and Ted O’Leary, “Accoun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able Person,”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2 (1987), 235–265; “Accounting Expertis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oduct: Economic Citizenship and Mod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8 (1993), 187–206; “Mediating Instruments and Making Markets: Capital Budgeting, Science and the Econom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2 (2007), 701–73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治理術的取徑與後面第四部分將討論的新經濟社會學的“經濟的社會建構”相關理論，具有高度的親近性。

- 41 在2007年的幾篇關於新經濟社會學與鑲嵌命題的回顧文章裡，這些缺失或多或少都被點出來，請參考 Neil Fligstein, and Luke Dauter,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105–128; Greta R. Krippner and Anthony S. Alvarez,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007), 219–240; Thomas D. Beamish,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xt Decade and Beyon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993–1014; 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1015–1034.

- 42 事實上，早在1996年 Michael J. Piore 在評論第一版的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時，就曾指出，新經濟社會學者並未清楚地說明，相較於古典社會學與舊經濟社會學等舊典範，新經濟社會學在對於相同的現象（如資本主義的興起）的解釋，具有怎樣的優點與進展，因而有改弦易轍的必要。同時，他更指出，新經濟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缺乏有力的整合架構，恐有害於相關知識的積累。請參閱 Michael J. Piore, “Review of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1996), 741–754.
- 43 新經濟社會學缺乏整合性理論架構的問題，近來亦為新經濟社會學者所注意，因此，他們試圖含納更多的議題與理論取徑，並試圖發展微觀到鉅觀的整合架構，請參考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2)。然而，正如 Jesper B. Sørensen, “Review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003), 534–537 所指出的，上述的這種含納更多議題與理論取徑的嘗試，終究只會使新經濟社會學更缺乏整合性的架構，一直處於發展進生的狀態。因此，他認為這種宣示與其說真的能解決理論上的困境，倒不如說反映出新經濟社會學作為社會學次學科自我認同的危機。
- 44 Ralph Fevre, *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Behaviour* (London: Sage, 2003).
- 45 在2002年的一場關於 Polanyi 與鑲嵌概念的論壇中，面對著 Greta R. Krippner 對於鑲嵌命題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批判，Granovetter 自我辯解地指出，在1985年時，他並不知道鑲嵌命題會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宣言，事實上他在1990年以後就已經改弦易轍，由“鑲嵌命題”轉向“經濟的社會建構”命題。因此，他認為不能把相關問題歸咎於他的作為與意圖。上述的對談，請參考 Krippner Greta R et al., “Symposium: A Conversation on Embeddedness,” *Socio-Economic Review* 2 (2004), 109–135。換言之，如果 Granovetter 的辯解是可接受的，那麼，對於鑲嵌命題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反省，不能只集中於 Granovetter 所提出的理論命題與相關困境，必須從學科發展的內部與外部條件來著眼，探究 Granovetter 的鑲嵌命題如何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又引發了怎樣的困境與修正。



- 46 在此必須提醒，這裡只是對於美國新經濟社會學所興起的歷史背景的一個簡單描述。由於本文並非對於當時經濟與社會背景的歷史考察，因此相關的討論難免過於簡化。事實上，除非我們相信簡單的知識與社會的反映關係，否則我們也很難單純由相關的歷史背景去推論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因此，這裡的簡介的軸線，主要重點仍然是知識構作歷程中，進入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經濟現象與議題，以及由此議題所折射出的既有理論缺失。同時，這裡也必須提醒，這些所謂的新興現象，並不具備有孔恩 (Thomas S. Kuhn) 所謂導致典範轉移的異例的意義。事實上，這些所謂新興現象往往具有深遠的歷史根源（意即這些所謂新興現象是否真的是新興現象是必須質疑的，但是新經濟社會學往往忽略此點），同時，社會科學相關理論的演變，也很難如同孔恩對於科學革命的描述。關於孔恩對科學革命的討論，請參閱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47 關於“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議題，請參閱 Adolf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關於“管理革命”的議題，請參閱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77)。
- 48 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回應所謂“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說法，發展了關於公司菁英的權力網絡與董事會聯鎖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的相關理論。關於此議題的回顧，請參閱 Mark S. Mizruchi, “What Do Interlocks Do? An Analysis,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Research 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996), 271–298; 並比較 Neil Fligstein, “Networks of Power or the Finance Conception of Control? Comment on Palmer, Barber, Zhou, and Soys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1995), 500–503 對此一取徑的批判。
- 49 關於後工業社會學的來臨與“福特化到後福特化”的生產模式的轉變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請參閱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Fran Tonkiss, *Contemporary Economic Sociology: Globalisation, Production,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 50 關於美國新經濟轉型與新經濟社會學的關係，請參閱 George Ritzer, “The Permanently New Economy: The Case for Reviving Economic Sociology,” *Work and Occupation* 16 (1989), 243–73; Fred L. Block,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Neil Fligste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1 相關文獻請參閱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uro F. Guillen, *Models of Management: Work,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Glob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Argentina, South Korea, and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Philip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52 關於此論點的文獻，請參閱 William Lazonick,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co Orrù,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7)。
- 53 “非正式經濟”的相關議題，常常是網絡分析切入經濟經驗現象的重要著力點。關於“非正式經濟”的相關討論，請參閱 Alejandro Portes, Manuel Castells, and Lauren A. Benton, eds.,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ejandro Portes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 1320–1350; Alejandro Portes, ed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並參見1987年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493卷專刊。
- 54 這些所謂新興現象的歷史起源“至少”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因此並非真正所謂的新興現象。新經濟社會學對此新興現象的認識，不但有著時間上的落差，對於此議題的理論解釋上亦往往存在著許多似是而非與理所當然的誤判。關於這一點的反省，請參考 Charles Perrow, “Organisational Theorists in a Society of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 (1992), 371–80;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 (2000), 469–476; *Organizing America: Wealth,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5 Greta R. Krippner,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 (2001), 775–810.
- 56 關於古典社會學時期的經濟社會學的介绍，以及二戰後相關發展的簡介，請參閱 Richard Swedberg,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35, 1, (1987), 1–215; Philippe Steiner,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95), 175–195。
- 57 這些的文章，大多已收錄 Charles Camic 所編的 Parsons 早期文集中，請參考 Talcott Parsons, *The Early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至於 Parsons 的知識生涯的介绍，請參閱 Talcott Parsons,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 (1970), 826–881; Peter Hamilton, 《派森思》，蔡明璋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Uta Gerhardt,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8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49).
- 59 關於此點，請參閱 Howard Brick, “Talcott Parsons’s ‘Shift Away from Economics’ 1937–194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7 (2000), 490–514。
- 60 Neil J. Smelser, “Parsons’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After Parsons: A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Renée C. Fox, Victor Lidz, and Harold J. Bershad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31–43.
- 61 關於 Parsons 與美國舊制度經濟學的關係，請參閱 Charles Camic, “The Making of a Method: A Histor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Pa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987), 421–439; “Reputation and Predecessor Selection: Pars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992), 421–445; Olav Velthui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rom Talcott Parsons to Mark Granovetter,”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8 (1999), 629–649。
- 62 Peter Hamilton, 《派森思》，蔡明璋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Uta Gerhardt,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63 Talcott Parsons, “The Motiv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6 (1940), 187–203; “Weber’s Economic



- Sociology,” in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1947]), 30–55; “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Man,” *Journal for General Education* 4 (1949), 46–53.
- 64 Talcott Parsons, Robert F. Bales, and Edward A. Shils,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3).
- 65 Talcott Parsons, “The Marshall Lecture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61 (1991 [1953]), 10–59。這裡必須提醒，此時 Parsons 對於經濟學的參照對象，已從新古典的個體經濟學，轉向當時蔚為主流的凱因斯總體經濟學。
- 66 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J.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6); Neil J. Smelser, “On Collaborating with Talcott Parsons: Some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Notes,”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1981), 143–154.
- 67 關於 Parsons 如何發展“一般媒介理論”來處理社會不同次系統之間的交換關係，請參閱 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 i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ed. Peter M. Blau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94–120。
- 68 Parsons 的兩位學生 Moore 與 Smelser，都曾試圖透過出版短文、教科書、讀本去推廣“舊經濟社會學”。請參考 Wilbert E. Moore,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5); Neil J. Smelser,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3); *Readings on Economic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5)。但是，這個取徑的影響力，相當的有限，請參考 Neil J. Smelser, “Parsons’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After Parsons: A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Renée C. Fox, Victor Lidz, and Harold J. Bersha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31–43。
- 69 當時以 Parsons 為首的功能論受到的攻擊是相當多面向的。在功能論內部，一方面有強調“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對於 Parsons “大理論”(grand theory)的質疑，另一方面，功能分析的缺陷與修正也逐漸浮上了檯面。在功能論外部，則是有來自鉅觀面所謂衝突論者的批判（無論新馬克思主義版本的，還是 Weber 版本的衝突論）與歷史社會學的興起，以及微觀面的交換理論、俗民方法論、符號互動論、戲劇理論、現象社會學等挑戰。這些批判與挑戰，有些固然言之成理，有些卻對 Parsons 的理論充滿著偏見與誤解。關於功能論的批判與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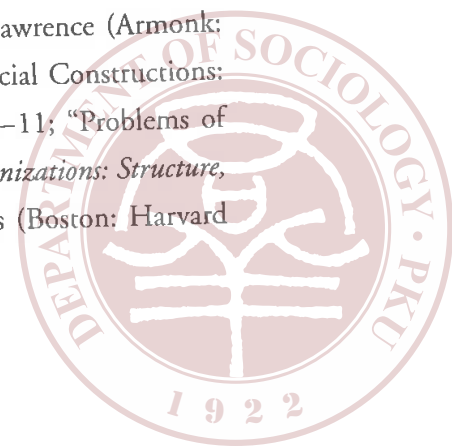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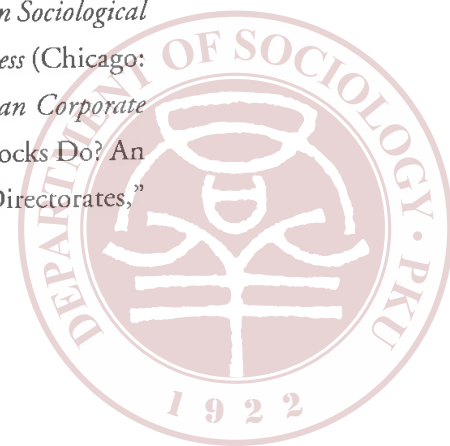
- 請參考 N. J. Demerath and R. A. Peterson, eds., *System, Change and Conflict: A Reader o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the Debate over Function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關於當時美國社會學內部的知識社會學考察，請參閱 Nicholas C. Mullins,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對於 Parsons 的澄清與捍衛，以及對二戰後相關爭議的論述史與學科史回顧，請參考 Jeffrey C. Alexander,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0 然而，這些優點，卻為大多數新經濟社會學者所忽視，請參看 Neil J. Smelser, “Parsons’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After Parsons: A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Renée C. Fox, Victor Lidz, and Harold J. Bershad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31–43; Jens Beckert, “Interpenetration Versus Embeddedness: The Premature Dismissal of Talcott Parson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5 (2006), 161–188。關於“經濟與社會”理論的後續發展與討論，請參考 1991 年 *Sociological Inquiry* 第 61 卷第 1 期，以及 Robert J. Holton and Bryan S. Turner,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Robert J. Holton,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Alberto Martinelli and Neil J. Smelser, “Economic Sociology: Historical Threads and Analytical Issues,” *Current Sociology* 38, 2–3, (1990), 1–49; Laurence S. Moss and Andrew Savchenko, eds., *Talcott Parsons: Economic Sociologist of the 20th Centur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6)。
- 71 關於此點，請參考 Jürgen Habermas, “Talcott Parsons: Problems of Theory Construc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51 (1981), 173–196。
- 72 由於 Parsons 對於規範、文化的重視，往往為他遭來過度社會化個人的批判。新經濟社會學對 Parsons 的批判，正是立基於這樣的論點上。關於過度社會化個人的批判，請參見 Dennis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183–93。但是，事實上，這樣批判卻也往往誤置了 Parsons 試圖由志願行動出發，建構社會秩序理論的企圖。這樣的誤解很大一部分也立基於 Parsons 對於形式分析與實質分析的混淆，請參看 Jeffrey C. Alexander,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A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177–198。



- 73 關於這些論點，請參看 Jeffrey C. Alexander,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alcott Parsons: A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177–198。
- 74 詳細的數字與分析，請參考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本文下面對於相關學術建制的討論，主要是立基於他們的研究成果上。
- 75 關於社會網路分析與所謂“哈佛革命”的介紹與分析，請參考 Linton C. Freema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Vancouver: Empirical Press, 2004)。關於 White 的學術生涯與理論發展，請參閱 G. Reza Azarian, *The General Sociology of Harrison C. White: Chaos and Order in Network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76 早在 1970 年代，White 就已經開始思考從社會網路出發來研究經濟議題，請參考 Harrison C. White,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981), 517–547; "Interview by Richard Swedberg,"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Re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8–95。而且，White 於 1970 年代所指導的幾個學生，後來都成爲 1994 年之前，復興社會學對經濟議題的分析的第一代學者，如 Granovetter、Michael Useem、Paul DiMaggio、Michael Schwartz 等人。Granovetter 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主要是在勞動市場的分析與一般理論議題的討論，請參閱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1360–1380;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abor Markets*, ed. Ivar Ber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11–47;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in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89–11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ocio-Economic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ed. Amitai Etzioni and Paul R. Lawrence (Armonk: M.E. Sharpe, 1991), 75–81;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 (1992), 3–11;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ed.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G. Eccles (Boston: Harv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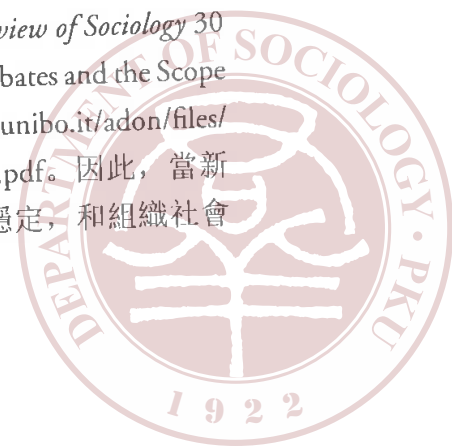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25–56。Useem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主要是在公司精英與權力關係方面，請參閱Michael Useem,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ecutive Defense: Shareholder Power and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至於DiMaggio的貢獻，主要引入關於文化方面的討論，請參考Paul DiMaggio, “Cultural Aspects of Economic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113–136;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27–57。除了上述這些White的指導學生的外，Granovetter與Schwartz所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更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發展的重要前哨站（美國重要的組織社會學家Perrow此時也任教於此）。1980年代，兩位受教於Granovetter與Perrow的新經濟社會學學者Walter W. Powell與Mitchel Abolafia也此一時期畢業於石溪分校。Powell的主要貢獻是在結合網絡分析與網絡型組織，請參見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Walter W. Powell and Laurel Smith-Doerr,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368–402。Abolafia的貢獻主要是在對於股票市場所做的民族誌考察與文化分析上，請參見Mitchel Abolafia, *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ets as Culture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 ed.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1998), 69–85。此外，Schwartz在石溪分校，更結合了社會網絡分析與新馬克思主義，發展對於美國公司精英的權力網絡與財政霸權等議題的討論，更指導出幾位關於董事會聯鎖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議題的重要學者，如Beth Mintz、Mark S. Mizruchi等，請參閱Beth Mintz and Michael Schwartz,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Interest Group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1981), 851–869;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Mark S. Mizruchi, *The American Corporate Network, 1904–1974*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What Do Interlocks Do? An Analysis,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Research 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996), 271–298; Mark S. Mizruchi and Michael Schwartz, eds., *Intercorporate Relation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Bus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ichael Schwarz, eds.,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 The Corporate Elite as a Ruling Clas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7)。除了上述這些的學者外，利用社會網路分析來探討經濟議題的第一代新經濟社會學家 Ronald S. Burt，乃是 White 之前學生 Edward O. Laumann 的指導學生，關於 Burt 的貢獻（特別是對於結構洞的討論），請參閱 Ronald S. Burt, *Toward a Structure Theory of Action: Network Models of Social Structure, Perceptions, and 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 Networks of Market Constraints and Directorate T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此外，新經濟社會學中利用社會網絡分析研究財務市場的先驅 Wayne E. Baker，雖然沒有與 White 或其學生有師生關係，但是跟 White 等人的知識網絡有密切的聯繫，關於 Baker 的著作，請參考 Wayne E. Baker,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1984a), 775–811; “The Floor Trading and Crowd Dynamics,” in *The Social Dynam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ed. Patricia A. Adler and Peter Adler (Greenwich: JAI Press, 1984), 107–128; “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1990), 589–625。簡言之，圍繞著 White 與其學生所建立起來的知識社群，乃是新經濟社會學出現的重要發展動力來源，社會網路分析也成為新經濟社會學最主要的分析取徑。關於上述的討論，更詳盡的分析，請參閱請參考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

- 77 所謂的組織社會學的新浪潮，主要是指經過50–60年代受“開放系統”理念影響下，對於組織的研究逐漸由組織內部的正式與非正式結構的關係，轉向了強調組織與環境的互動。因此，在1970年代，興起了一波關於組織的新理論，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組織生態學、資源依賴理論，以及組織新制度論。這些新取徑，或多或少都試圖提供了新觀點來討論當時美國公司與產業的狀況，請參閱 W. Richard Scott, “Reflections on a Half-Century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004), 1–21; Neil Fligstein, “Organizations: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the Scope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2001) at: [http://didattica.spbo.unibo.it/adon/files/fligstein\\_organizations\\_and\\_organizational\\_theory\\_2001.pdf](http://didattica.spbo.unibo.it/adon/files/fligstein_organizations_and_organizational_theory_2001.pdf)。因此，當新經濟社會學在1980年代中出現，並企圖在1990年代穩定，和組織社會



- 學的結盟，乃是極為關鍵的。只是，我們必須指出，新經濟社會學與新組織社會學的結合，主要有兩方面的論述策略：一方面是批判採取經濟觀點的組織理論，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與代理人理論，以及組織生態學，藉此建立社會學觀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結合比較具有社會學色彩的資源依賴理論與組織新制度論，發展新經濟社會學相關理論。其中，組織新制度論對於新經濟社會學往制度面的發展，可以說最為關鍵的。關於對於經濟觀點的組織理論的批判，請參閱 Charles Perrow,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Hegemony: A Critique of Chandler and Williamson," in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Behavior*, ed. Andrew H. Van De Ven and William F. Joyce (New York: Wiley, 1981), 371–86, 403–4; "Economic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5 (1986), 11–145。關於組織新制度的相關文獻，請參考 Paul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147–160;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38;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Preface," *Theory and Society* 15 (1986), 1–10。
- 78 關於此點，請參閱 Richard Swedberg,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35, 1, (1987), 1–215;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Redefining their Boundaries: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9 Gary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80 關於此點，請參見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Paul Hirsch, Stuart Michaels, and Ray Friedman, "Dirty Hands versus Clean Models: Is Sociology in Danger of Being Seduced by Economics?" *Theory and Society* 16 (1987), 317–336; Richard Swedberg, Ulf Himmelstrand, and Goran Brulin,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emises and Promises," *Theory and Society* 16 (1987), 169–213;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3–26。
- 81 關於此點，請參見 James S. Coleman, "Introducing Social Structure into Economic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8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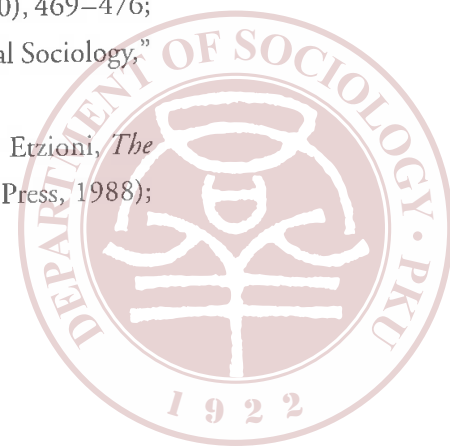
Richard Swedberg,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xogenous Factor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4 (1985), 905–920;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個外生變數與內生變數的問題上，Granovetter的鑲嵌命題與Coleman的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展現出在高度的相似性。

- 82 經濟學家們往往利用“as if”的工具論立場，去捍衛其非現實性的行為假設。對這種方法論的立場而言，其理論命題的有效與否與漂亮與否，並不在於命題的假設與前提是否正確地反映了社會實在，而是在於理論命題的預測能力，以及所需要的假設多寡與否（parsimony原則）。關於這個命題的簡介，以及對於理性選擇的理論預設與方法論的檢討，請參閱Raymond Boudon,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998), 817–828。
- 83 關於此點，請參看Paul Hirsch, Stuart Michaels, and Ray Friedman, "Dirty Hands versus Clean Models: Is Sociology in Danger of Being Seduced by Economics?" *Theory and Society* 16 (1987), 317–336;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 3–26。
- 84 Granovetter的鑲嵌命題之所以會成為新經濟社會學主導性概念（當時事實上可以有其他的選擇，特別是同樣由網絡分析出發的White的“市場從網絡中誕生”命題），主要的原因是該命題具體地呼應了新經濟社會學當時所處的論述空間與論述策略所形構的知識論文化（新議題的出現、經濟社會學的新舊對立、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區隔）。同時，Granovetter也透過駁斥新古典經濟學、舊經濟社會學與Polanyi的經濟人類學對於“自律市場”的承認，提出了“在現代社會，經濟並沒有去鑲嵌，經濟行動仍是鑲嵌在社會網絡裡”的宣言性主張，證成新經濟社會學介入經濟議題的正當性，也具體地道出了社會網絡分析的“鑲嵌性思考”。而且，Granovetter更透過對話新制度經濟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具體地設定了鑲嵌命題的理論建構的議程，提供新經濟社會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更詳細Granovetter對鑲嵌命題的理論設定，請參考第四部分的討論）。除上述知識上的原因外，一定程度上，這也由於Granovetter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穩定化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特別是爭取到Russell Sage基金會的贊助與支持），這對於鑲嵌命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主導性概念，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上述的知識內在因素與社會外在因



素，同樣也反映在 Swedberg 如何從新經濟社會學相關社群的外來者，轉變成關鍵性角色的過程中。

- 85 1990年代，美國社會學進入了不景氣時期（無論在職缺、學生人數與研究經費上）。新經濟社會學能夠在這段期間由出現到穩定，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1987年後 Russell Sage 基金會的贊助與支持。這個基金會持續地贊助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計劃、研討會與書籍出版，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穩定化有著莫大的助益。這個基金會主要是由 Granovetter 與 Swedberg 爭取來的，也因此，這兩人也幾乎成爲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發言人（Granovetter 提供理論性的宣言，Swedberg 整理相關知識系譜與研究成果，並編輯相關文集與手冊）。1994年，於此基金會贊助下，第一版的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的出版（2005年第二版亦是由該基金會贊助出版），使得新經濟社會學此一新興次學科得以有清楚自我認同與定位。此一手冊的出版，亦象徵著新經濟社會學在1990年代，邁向了穩定化的發展。Russell Sage 基金會的新經濟社會學相關出版品，請參考其網絡首頁 <https://www.russellsage.org/>。更詳細的分析，請參考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
- 86 由於相關的課程、期刊文章、論文集、讀本、研究手冊、教科書、教職的蓬勃發展，以及大量學者的投入，新經濟社會學在2000年成爲美國社會學學會的正式分會，並出版自己的分會通訊。請參考該分會網頁 <http://www2.asanet.org/sectionecon/>。
- 87 除了上述這種封閉性與排他性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經濟社會學家與組織社會學家往商學院教職的移動（如上述提到 Granovetter、DiMaggio、Powell、Baker、Mizruchi、Useem、Burt 等人，都曾在或正在商學院任教）。商學院的教職，一方面有助於社會學對經濟議題關心的正當性，也有助於資料取得；另一方面，往商學院的移動，也標示著1970年代激進社會學的元素，逐漸消失在新經濟社會學之中，這也使得組織社會學跟新經濟社會學有沾染上商業利益與意識型態之虞，導致相關知識進展有過於往實務議題靠攏，缺乏理論反省的危險。關於此議題的討論，請參考 Charles Perrow, "Organisational Theorists in a Society of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 (1992), 371–80;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2000), 469–476; W. Richard Scott, "Reflections on a Half-Century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004), 1–21。
- 88 關於 Etzioni 所發展的社會經濟學的相關文獻，請參見 Amitai Etzioni,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s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The Methodology of Socio-Economic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7 (1998), 539–549; *Essays in Socio-Economics* (New York: Springer, 1999); Amitai Etzioni and Paul R. Lawrence, *Socio-Economic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Armonk: M.E. Sharpe, 1991)。社會經濟學取徑的主要推動機關則是1989年設立的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主要刊物是 *Socio-Economic Review*。請參考該學位的網頁 <http://www.sase.org/>。

- 89 關於 Zelizer 的相關文獻，請參閱 Viviana A. Zelizer,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Beyond the Polemics on Market: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 *Sociological Forum* 3 (1988), 614–634;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Enter Culture,”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 Mauro F. Guillen, Randal Collins, Paula England, and Marshall Meyer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2), 101–125;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ition, ed.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331–354;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關於 Smith 的文獻，請參見 Charles Smith, *The Mind of the Market: A Study of Stock Market Philosophies, Their Us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London: Croom Helm, 1981); *Auc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Success and Survival on Wall Street: Understanding the Mind of the Market*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Markets as Definitional Practice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2007), 1–39。
- 90 事實上，以網絡分析為主的新經濟社會學，在發軔初期，是排斥所謂道德、文化、認知等解釋因素的（斥之為過度社會化個人的謬誤）。這一點最為清楚地表現在 Zelizer 的取徑與新經濟社會學，既競爭又結合的曖昧關係上，請參見 Viviana A. Zelizer, “Beyond the Polemics on Market: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 *Sociological Forum* 3 (1988), 614–634; “Pasts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2007), 1056–1069。至於新經濟社會學如何透過排斥舊理論，拒斥反學科與跨學科的取徑，進而確立自己學科正當性的考察，請參見 Bernard Convert an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2007), 31–54。
- 91 這裡主要考慮的是新經濟社會學所座落的美國社會學內部的狀況。有趣的是，在英語圈內的英國社會學，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了由 Barry





Hindess與Bryan R. Roberts et al., 所編輯的經濟議題的社會學文集(較具理論傾向與跨學科特性), 請參見Barry Hindess, eds.,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77); Bryan R. Robert, Ruth Finnegan, and Duncan Gallie, *New Approaches to Economic Lif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nemployment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此外, 也幾乎在同一時期附近, 英國出現了頗為興盛的會計社會學領域(主要的學者有Peter N. Miller、Michael Power、Anthony G. Hopwood等人)。英國會計社會學的主要學術期刊有1976年創刊的*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以及1990年創刊的*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關於會計社會學的回顧, 請參考Anthony G. Hopwood and Peter Miller, eds., *Accounting a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Norman B. Macintosh and Trevor Hopper, eds., *Accounting, the Social and the Political: Classics, Contemporary and Beyond* (Oxford: Elsevier, 2005); Peter Miller,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How and Why Sociology Forgot Accounting," (2006) at: [http://fek.uu.se/documents/research/uppsalalectures/UL\\_2006\\_PM\\_3.pdf](http://fek.uu.se/documents/research/uppsalalectures/UL_2006_PM_3.pdf)。至於, 歐洲經濟社會學的發展, 請參考Jens Beckert and Richard Swedberg, "Int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 (2001), 379–386; Richard Swedberg and Jens Beckert, "Perface," *European Societies* 3 (2001), 5–10; Johan Heilbron, "Economic Sociology in France," *European Societies* 3 (2001), 41–67; Filippo Barbera, "Economic Sociology in Italy: Past and Pres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2002), 145–157, 以及《經濟社會學歐洲電子通訊》(*Economic Sociology-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上的相關資訊, 請參考該通訊的網頁[http://econsoc.mpifg.de/Newsletter/newsletter\\_current.asp](http://econsoc.mpifg.de/Newsletter/newsletter_current.asp)。只是, 這些幾乎同時期的發展, 在2000年前幾乎為大多數美國新經濟社會學家所忽視。

- 92 Pierre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8.

